

日本百年外交论

主编 米庆余
副主编 熊沛彪 肖伟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前 言

本书是在日本国际交流基金资助下，由南开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外交研究课题组成员和部分校外学者共同完成的。严格地说，这些成果还是初步的。我们希望得到学界的审议，以期今后的研究更上一个台阶。

人们知道，外交问题的研究，历来是比较困难的。一是因为任何国家的外交，无不带有机密性，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不可能全面公布原始档案，即使是过了保密期，由于种种原因（诸如涉及现实问题、原始档案资料的损失），也不可能都是完整无缺的；二是任何国家的外交，无不受到国际关系的制约和来自对象国的反应。因而，外交又具有复杂性。本书所谓的外交，是指国家行为，是某个国家为了贯彻或实施其政策而从事的涉外活动。其目的在于维护和增进本国的权益，唯是权益的性质有所不同。也就是说，没有脱离政策的外交，也没有任何外交是不具目的的。这也是本书研究日本外交问题的基本点。

本书将百余年的日本外交分为战前、战后两部分。这主要是根据时间断限。当然，两者也是有所区别的：比如，战前的日本外交，基本上是围绕着“大陆政策”而展开的强权政治和武装侵略，这是无法否认的；而战后的日本外交，则可谓迄今主要是以日美关系为基轴的，这也是两者的主要区别。与此同时，人们在研究中发现，日本百余年的外交大体上是在妥协与摩擦、同盟与对抗、自主与追求等形态中展开的。这些相互渗透、有所主从选择的外交形态，从根本上说，是日本的国家实力和政策取向决定的，同时也是国际关系或国际环境造成的。如战前的日本为了同

F196-5016

沙皇俄国争夺东北亚地区的霸权，便是通过对英结盟而完成对俄战争的外交准备并对俄一战的，而战后的日本外交，在与美国结盟并以日美关系为核心的同时，根据本国的发展和需要，也有战略性的自主和追求。关于这些外交形态，本书力求在深入研究日本外交政策的基础上，作出实证性的分析，以期正确地认识日本百余年外交的历史和现状。

1995年1月，日本首相村山富市在第132届国会上的施政演说中谈到：“我再一次强调，在迎来战后50周年之际，日本不能忘记对过去的反省，要全力以赴地去创造世界和平，这是日本外交的基点。我们要走向的和平道路不是靠武力来实现，而是通过从过去痛苦的教训中得到的智慧和领先世界的技术实力，以及通过我们的经济合作来实现世界的和平和繁荣。”（见日本驻华大使馆文化处《日本简讯》，第97期，1995年3月15日）本书与这种尊重历史、创造世界和平的愿望是吻合的。从这个意义上讲，认真地总结和研究日本对亚洲近邻国家的外交政策，不仅具有现实意义，而且具有长远的战略价值。本书希望通过日本外交的研究，使中日关系、亚洲各国关系乃至世界各国关系，真正建立在平等互利、和平友好的基础之上。

本书所收集的论文，基本上是在小型专题报告后完成的。在此期间，课题组成员还先后多次听取了国内外专家学者的讲座或专题报告。按照原计划，本书应对日本外交的典型人物、事例，依次作出比较完整的论述，但因时间的关系，未能完全达到设想的要求。

在本书出版之际，编者代表课题组成员和作者，对资助研究和资助出版的日本国际交流基金、对来校讲学的国内外专家学者、对协助出版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一并表示深切的感谢。

编者

1997年8月于南开大学日本研究中心

目 录

概述日本百年外交形态的变迁(代序论)…… 熊沛彪 肖 伟(1)

战前篇

- 日清战争外交史论 米庆余(15)
- 小村外相与日俄战争 陈友华(40)
- 一战期间日本对华外交 米庆余(74)
- 从“币原外交”到“田中外交” 邵建国(98)
- 也论币原外交..... 米庆余 乔林生(113)
-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的对华二重外交
- 与国民政府的对策 熊沛彪(132)
- 有田外相与中日关系..... [日]樋口秀实(156)
- “佐藤外交”——“协和外交”的继续..... 熊沛彪(186)

战后篇

- 鸠山内阁与日苏关系..... 祝淑春(205)
- 岸信介内阁与日美“安保条约”..... 张 健(224)
- 日本对东南亚的“赔偿外交”..... 臧佩红(244)
- 田中、大平内阁与中日关系 梁云祥(268)
- 论 80 年代日本的综合安全保障战略
- 以大平、中曾根内阁的研究报告为中心..... 肖 伟(296)

中曾根内阁的大国外交	肖 伟(322)
日本平成时期的联合国中心外交	梁云祥(346)
战后日本防卫计划的发展与质变	韩世辉(368)

概述日本百年外交形态的变迁

代序论

熊沛彪 肖 伟

自明治维新以来，日本百余年的外交形态表现出极大的变化，这种变化是自明治维新以来日本的国家性质决定的，也是其自身的综合国力所决定的，还是受国际关系制约而产生的。日本各个时期的外交政策是其对外追求国家利益的产物，亦是其对内政策的外延。研究这一漫长历史时期的日本外交，必须注意其在各个历史时期的特点，并分析其不断变化的原因。本文认为，日本这百余年的外交变迁主要出现了追随外交、协调外交、大国外交三种形态，并呈现出大循环往复进行的现象。下面拟就这种现象将战前和战后的日本外交作一初步比较。

一 追随外交

日本的近代外交是自明治维新开始的。其实施初期，由于国力贫弱，及正在初步形成的半殖民地地位，日本在外交上首先选择了追随欧美列强的政策。

明治维新后，日本走上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并在较短时间内获得飞跃发展。但是，日本急于求成式的“脱亚入欧”并无长时期的资本积累为坚实基础，更无资产阶级议会政治的传统作依托，仓促间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带有浓厚的封建色彩，在国际竞争中不能

不依赖军事力量扩展市场，这就使军国主义得以很快形成和发展，这反过来又加速了对外侵略扩张的进程。

不过，日本因走上维新道路不久，自身亦与欧美列强订有半殖民地性质的不平等条约，国内矛盾重重，尤其是其综合国力远远无法与英、美、法、俄等国抗衡。目睹欧美列强争先恐后地攫取在东亚地区的殖民权益，日本决定“脱亚入欧”，以便一面发展国内的资本主义，一面尾追欧美列强，谋求在东亚地区推行局部性扩张，并逐步修改与欧美的不平等条约。同时，日本推行的追随外交还明显具有攀附强援的特征，即极力取悦于欧美列强，争取其支持或默许日本对邻近弱小国家的侵略扩张。这一政策一直延续到中日甲午战争，它决定了明治时期日本追随外交的形成和展开。

在这一轮追随外交时期，日本在美、英等列强的支持或默许下，出兵台湾，入侵朝鲜，吞并琉球，发动中日甲午战争，在国际上取得了殖民帝国的地位。此后，日本作为列强中的一员，为保护和扩张在东亚大陆的殖民权益，采取了与欧美列强大致平行的扩张步骤，并在与欧美列强发生矛盾和冲突时，尽可能地采取了协调的办法，其外交随之转入与欧美列强协调的时期。

追随外交是日本在国际地位低下、国力贫弱的条件下实施维新，力图“脱亚入欧”，成为列强一员而选择的对外政策。一旦类似的国内外条件再次出现，日本仍将作出这种选择。战后，日本因战败投降，在美军的控制下，不得不接受来自美国的指令。同时，因长时期的对外战争，国民经济崩溃，这亦迫使日本不得不进一步依赖美国。因此，追随外交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又一次展开。

在这一轮追随外交时期，日本为自保和逐步恢复其经济及国际地位，确定了追随和攀附美国，优先发展经济的政策。在美国的袒护下，日本对外实现了“片面媾和”，与美国订立了“安保条约”，并于1956年底加入联合国，从而重返国际社会。同时，日本还躲开了大量战争赔偿，并展开“经济外交”，以些许赔偿为手段，再次打入

东南亚市场。

在国际政治方面，日本亦采取了追随美国的政策。为适应美国全球反共政策的需要，朝鲜战争期间，日本对美韩在外交上支持、军事上辅助，并获得生产大量“特需”的利益。1965年6月，日本与韩国签署了《日韩条约》，用以加强亚洲的反共体制。在越战期间，佐藤内阁更是在军事、外交方面全面支持美国。不过，自60年代末始，国际形势开始发生巨大变化，日本也逐步摆脱了战败的阴影，其追随外交亦随之出现重大变化，其外交逐步转向与美国协调的方面。

不可忽视的是，在这两个历史阶段，日本的追随外交中亦含有争取自主的成分。明治维新初期，日本为在国际上不再扩大与欧美各国的差距，并力争尽快缩小这种差距，特地派出岩仓使节团出访欧美各国。其目的是在考察和学习欧美政治、经济制度；同时，争取修改与欧美各国之间的不平等条约。此后，日本一边努力发展国内资本主义，一边不断与欧美各国交涉修改不平等条约问题。日本争取修改条约的目的，一是要实现国家的安全独立，二是欲在国际上取得与欧美各国平等的地位，以获得列强中一员的资格，便于配合对外扩张政策，参加列强对远东地区的瓜分。在与各国交涉的同时，日本朝野不断强调“脱亚入欧”，其欧化政策和对外扩张政策亦在着着推进，继出兵台湾后，日本又以炮舰侵入朝鲜。对外扩张着着得手，使日本增强了缩短与欧美各国的差距，尽快加入列强行列的信心。外务卿井上馨即强调要在东洋土地上创造出一个欧洲的新帝国，取得与欧美各国的同等地位。这表明，日本的追随外交只是国力困乏时期暂时的外交方式，其目的是通过追随实现成为列强一员的目标。

战后，吉田茂内阁在外交政策上制定了通商战略，其主旨是对内优先发展经济；对外，在政治上依靠美国，在经济上谋求发展与各国的贸易。目标是实现“轻兵富国”，并加入西方阵营，获得与各

西方国家平行的地位。这就是说,日本一方面依赖美国,另一方面则在谋求自主和对等。1954年底,鸠山内阁成立伊始,即确定自主外交是其三大政策目标之一,该内阁深知旧金山条约订立不久,依附美国还是一个难以摆脱的现实,因此决定其自主外交以不拉开与美国既有的距离为前提,通过发展与其他国家的双边关系逐步争取外交的自主。军事力量历来就是自主和对等的有力后盾,鸠山内阁即主张修改宪法第九条,以在法律上认定行使战争的权力以及重新武装的必要性。这一主张虽因在野党和国民的坚决反对而未实现,但它反映了旧金山片面媾和条约订立后日本政府急欲争取与各国对等地位的意图。接着,日本为减少日美安保条约对苏联的刺激,争取苏联支持其加入联合国,于1956年10月与苏联恢复邦交,苏联则表示不反对日本回到国际社会。12月日本加入联合国,迈出了争取实现与美欧等国平等的重要一步。

为进一步提高国际地位,岸内阁积极与美国协商修改日美间的安保条约。1960年1月19日,日美两国签署了《日本与美利坚合众国合作及安全保障条约》,即“新安保条约”。尽管这次修改安保条约,日本只是在表面上实现了与美国的平等,但仍有利于在国际上提高日本的地位,并有利于以后实现与美国完全对等地位的目标。

经济外交是国内经济高速增长的需要,也是争取与美国对等的一个重要手段。1957年日本政府正式提出经济外交的方针,并将这一方针和“与亚洲国家善邻友好”、“调整对美关系”并列为日本外交相互联系的三大课题,即以经济外交一面改善与亚洲各国的关系,一面吸收亚洲各国的资源,占据亚洲市场,促进国内经济的发展。与亚洲各国关系的改善和国内经济的发展必然提高日本的国际地位,这有利于推动日美关系的调整。而日美关系的不断调整,结果将是双方合作关系的加强,有利于日本争取与美国的对等地位。池田勇人组阁后,提出“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目标是10年之内(1960—1970年)使GNP增长6倍。这一计划需要进一步扩大海外

市场，因此，池田在极力扩大对美和对东南亚贸易的同时，历访西欧各国，大力开展对西欧的经济外交，打开了西欧市场。海外市场的扩大，加速了日本国内经济的高速增长，同时也提高了日本的国际地位，使美国不能不考虑将日本作为一个对等伙伴的问题。可以说，经济外交是战败后日本的一种合理的外交选择，它一开始就走向了成功方向。

二 协调外交

协调外交作为一外交用语正式由日本政府提出是在20年代的币原外交时期。其实，在国际上与欧美协调的政策早在中日甲午战争后即出台。

中日甲午战争后，日本割占台湾和澎湖列岛，并且，其势力大举侵入朝鲜，勒索来的战争赔偿又使其国内资本主义实力迅速增强，其国际地位发生了巨大变化，并迅速成为国际列强中的一员。这在八国联军入侵中国时日军充当其主力即是其标志。

不过，日本与各资本主义列强协调的政策并不是绝对的协调，其中也包含着争夺。在中日甲午战争时期，日本即窥视中国东北的利权。而八国联军入侵中国之后，俄军赖在东北不走，日俄矛盾因此激化。日本与英、美等国协调后，争取到了与英国的同盟及美国的暗中支持，于是决定对俄一战。

日本在英国的支持下取得日俄战争的胜利，其在东亚国际关系中的地位进一步上升。其战略地位因霸占朝鲜、割取库页岛南部及控制中国东北南部部分要地而发生了很大变化，侵略野心随之急剧膨胀。

但是，日俄战争后，因美国反对日本独占中国东北南部，英国也不支持日本对该地区的独占政策，日本只得转而缓和与俄国的紧张关系，并与之签订密约，互相划定在中国东北的势力范围。这一

时期，日本一面欲尽可能向中国扩张，另一方面又不能不认识到，虽然在国际上取得了强国的地位，但在无强援的条件下，还难以逐一排除向中国扩张过程中的竞争对手，因此仍在外交上采取了以协调为手段，争取俄、英、美、法的部分承认或默认，稳步推进局部扩张的方针。于是，日本先后四次与俄国签订密约，划分在中国东北的势力范围，并与英国订立了第二、三次同盟条约。

日本的侵略欲望因先后战胜清朝和俄国而急剧膨胀，但在列强共同瓜分中国而形成均势的情况下，日本只能与英、美、俄等国协调，以与各强国大致均衡的步调向中国扩张。

但是，日本并不甘心在列强共同瓜分中国的均势中仅充当列强中一员的角色。日本看到，欧洲两大对立的军事集团正在形成，战争难以避免，中国的局势亦显露出大动荡的征兆，这些都有利于日本抓住机会大力对华扩张。因此决定要在中国确立“优势地位”。并暗中布置与各强国争夺中国。

日本决定要在中国攫取超越英、美、俄等国的优势地位的政策目标，意味着日本终将在东亚国际关系中不但要与中国为敌，而且还将不可避免地要与英、美、俄等国为敌，换言之，日本与英国的同盟及与各国的协约（定）关系都是暂时的，随着日本不断向东亚大陆扩张，其与美、英等国的矛盾必然日益突出起来。然而，日本的综合国力远不能与美、英等国抗衡；在资源、技术、贸易等方面，日本资本主义对欧美具有很大的依赖性。一旦与美、英等国的矛盾激化至不可调和之时，日本极易遭受致命的打击。因此可以说，日本在东亚大陆超越英、美等以上“优势地位”的扩张战略的基础一开始就是脆弱的。这种脆弱性是日本以后对外战略及军事与外交混乱的主要原因。

正因为日俄战争后日本对外战略目标与其综合实力极不相称，日本才强调在国际上要依靠日英同盟。由于美国的牵制及英国不愿看到日本进一步大规模向中国扩张，日本只得强调要等待有利时

机，以一举实现其战略目标。这就构成了日本此后外交上的投机性特点。

日本外交上的投机性特点在一战期间表现得淋漓尽致。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借口履行日英同盟的义务，对德宣战，夺得山东半岛和德属南洋群岛后，即向袁世凯提出“二十一条要求”，企图一举控制中国。由于中国方面的抵制及英美等国提出抗议，日本感到完全不顾英美等国的抗议，在外交上摆脱与英美等国的协调，控制中国的时期还不成熟，于是只得删去了“二十一条”中欲独霸中国的第五号，并强迫袁世凯政权接受了其他各号条款，扩大了在华权益。

日本投机取巧般地对华大规模扩张，并无有力的战略依托，即在列强共同瓜分在华权益的格局下无法采取以有效的政治、军事及外交手段排斥列国的措施，强行向中国推行独占性的扩张政策不仅要遭到中国的抵抗，而且还必然引起英美等国的反对。无力对抗，就只能后退。战后，美英不断采取行动牵制日本的对华政策。面对前所未有的孤立处境，日本被迫步步后退，在华盛顿会议上接受了《九国公约》和《海军吨位比例条约》等。

在华盛顿体制的制约下，日本只得进一步转换对华政策，强调要与美英等实行“国际协调”。1924年6月，币原喜重郎出任外相，逐步将这一“国际协调”推向顶点。

协调外交是诸强国力量大致形成均衡时期的产物，不但战前如此，战后亦如此。自60年代末始，国际格局开始发生重大变化，出现了多极化趋向。日本与西欧经济迅速崛起，对美国的经济优势形成挑战，特别是日本，在60年代末一举成为资本主义世界中第二位的经济大国。与此同时，非洲一批小国相继宣布独立，在国际舞台上逐渐成为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对美国的霸权形成新的牵制；OPEC于1973年宣布大幅度提高石油价格，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世界经济陷入长期低迷状态；苏联继续实施其政治、军事挑战；美

国则在越南战争中长期消耗，力量相对削弱。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对维护自己的霸权已感到力不从心。因此，美国不得不寻求“责任分担”和多国协调。1975年首次召开的西方七国首脑会议，可以说是多极化趋势条件下资本主义世界国际协调开始形成的标志。

这一时期，日本恢复了在冲绳的施政权，并逐渐建立了对美平等伙伴关系。1976年，日本防卫费倍增的第四次防卫计划完成，其由此拥有世界上屈指可数的庞大的非核武装力量。通过扩大防卫力量，日本成为美国在亚洲重要的军事伙伴。经济大国的地位和其拥有的庞大军事力量，使日本的国际地位不断上升，日美关系由日本对美国的依赖转向相互依存。

但是，相互协调和相互依存并不能取代日美间的利益差异。为尽快打开中国市场，1972年9月，日本抢在美国的前面与中国恢复了邦交。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发生，日本从自身利益出发，采取了有异于美国的外交政策，保持了与中东国家的正常关系。1979年继发第二次石油危机，日本再次采取了与美国不同的立场，在制裁伊朗等问题上对美国不予明确支持。

随着美国在全球的地位不断削弱，日本作为经济大国的重要性日益突出起来。日本看到了这点，佐藤内阁利用美国的需要，巧妙地将外交与加强日美同盟结合在一起，通过与美国的协调，初步实现了在亚太地区与美国的“责任分担”，日本由此成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一个平等合作的伙伴，从而迎来了佐藤内阁自称的“太平洋新时代”。70年代末，苏联在全球采取了大规模的攻势战略。国际局势尤其是印度支那、中东地区局势动荡不安。更有甚者，1979年，苏联突然入侵阿富汗，激发了美苏“新冷战”。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不得不进一步寻求与各盟国的协调。面对紧张的国际局势和“责任分担”的进一步要求，大平内阁（1978年12月—1980年6月）提出了“综合安全保障战略”，提出在确保经济安全的同时，首次将日本定义为“西方的一员”，表明要努力扩大日本在国际安全方面的作

用，使日本成为西方全球战略防卫中的重要一环。

日本谋求在国际安全方面发挥影响和作用的政策在中曾根内阁（1982年12月—1987年11月）时期有了进一步发展。中曾根在任期间，提出“国际国家”这一以国际权力为指向的外交目标，其内容是继与苏联对抗的美欧二极之后成为新的一极，使日本加入到国际运营者的行列。为实现这一目标，中曾根内阁将加强军事力量置于前所未有的重要位置，军费开支突破了“GNP1%”的限额。不过，这一时期，日本还不敢直接与苏联进行军事对抗，美欧也没有认定其作为一极的重要地位，只是将其作为“不沉的航空母舰”而加以利用。

综观这一时期日本的外交政策，可以看到，随着国力的提高，日本在逐步提升外交政策目标，并在不断寻求外交政策的转换。从佐藤内阁的“太平洋新时代”、大平内阁的“西方一员”，到中曾根内阁的“国际国家”，表明日本摆脱了战败的阴影，不但重新回到国际社会，而且作为西方国家群体中的重要一员，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虽然其谋求提升自身国际地位的努力还颇费周折，但其由经济大国迈向政治大国的倾向已开始显露出来。

日本在不同历史时期推行的协调外交虽是以协调为主，但其中亦含有超越协调的因素。这种超越协调的因素是随着其综合国力的加强及国际地位的提高而出现的。日俄战争后，日本政府即提出要在中国建立优于各国的“优势地位”。一战期间，日本向袁世凯政权强提“二十一条”虽属投机取巧的一次行动，但其欲在有利时期独霸中国的企图却暴露无遗。“九一八”事变之前，日本虽推行协调外交，但田中内阁时期日本欲打破《九国公约》，独霸中国东北的企图作为国策确定了下来。

应该看到，战后，日本经过民主改革，国家性质已有了巨大的变化，通商成为日本对外政策的主题。经过经济高速增长后，日本的国力空前增强，国际地位亦迅速提高，保护国内的工农业并进一

步扩大海外市场成为日本极力追求的一个最重要的目标。这就与美国及西欧的世界通商政策发生了冲突。到80年代,双边贸易摩擦尤其是日美贸易摩擦愈演愈烈。虽然每次激烈的冲突大都以双方相互妥协而避开决裂,但冲突的根源并没有消除,日本在外交上超越协调的因素亦日益明显。

三 大国外交

日本的大国外交最早出现于战前。“九一八”事变后,日本见英美对撕毁《九国公约》,破坏华盛顿体制的行为并无力加以有效干涉,于是决定我行我素,退出国联,抛弃以往推行的“协调外交”,决定在东亚建立以自我为中心的国际秩序,其欲称霸东亚的大国外交由此出台。这一外交的主旨首先是强调反对各国在中国的政治、军事活动,各国在中国的经济、金融等活动亦须以日本为中心,否则日本将以东亚“惟一有效”的势力加以阻止。这在日本于1934年4月发表的“天羽声明”中作了明确的说明。在这种外交方针的指导下,日本加紧推进其侵华政策。

首先,日本企图以外交交涉达到变中国为其保护国的目标,于是由外务省和军部分头推行“协和外交”和“武力外交”,先后推出“经济提携”、广田三原则、华北自治、“中日悬案”交涉以及“左藤外交”等。南京国民政府对此十分警戒,虽不与之决裂,但也不接受其要求;英美则采取加紧援华的措施,牵制日本独霸中国的政策,日本的企图落空。

接着,日本借卢沟桥事件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企图以战争实现其“东亚新秩序”。为此,日本一面全力从事对华战争,一面以各种手段迫使中国与其“和谈”,迫使英、法与其交涉援华事项,与德意订立三国同盟,拉苏联与之订立中立条约,在日美交涉中多方胁迫美国等。但是,中国军民的不屈不挠,坚持长期抗战,美、苏、英

等国逐步以各种方式援华抑日，并在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后，先后以军事手段与中国军民一道击败了军国日本，迫使日本无条件投降，日本的这一轮大国外交从而彻底破产。

应该说，大国外交并不是仅指推行霸权的外交，在一定条件下，它可能是追求或维持与各大国并立的外交，90年代初冷战体制瓦解后日本的大国外交就是这种类型。1989年东欧剧变，1990年两德统一，华约解散，1991年苏联解体，两极体制彻底瓦解，战后以来延续了50余年的冷战宣告结束。至此，旧有国际秩序不复存在，新的国际秩序却尚未形成，国际形势处于一种不确定的流动状态之中。冷战后国际政治出现了权力真空，日本以自身庞大的经济实力和不容忽视的军事力量为后盾，推出了大国外交。1990年1月9日，海部首相致信布什总统，提出“必须以美、日、欧三极为主导形成世界新秩序”，1990年外务省次官栗山尚一具体提出冷战后的国际秩序应以美、欧、日5:5:3的力量结构为基础。在此，日本将扩大在全球的影响力、构筑美、欧、日三极主导的世界秩序确定为其对外政策中的一个重要目标。

这一时期，日本愈益重视亚洲，期望在建立亚太区域合作和亚太安全体制的过程中起主导作用，并且拟将亚洲作为影响世界的基地。此外，日本还提出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外交政策，期望利用联合国这一多边组织的合法性谋求扩大日本对国际事物的影响力。为此，日本加快了争当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步伐。为使其大国外交拥有强固的国际支柱，1996年4月，与美国改订了“日美安保条约”，明确规定两国在亚太地区实行密切的军事合作，并对日美关系作了重新定义，认为日美关系是亚太地区乃至整个世界最重要的关系，并且表明要使日美双边同盟广泛适应于世界，以发挥更大的国际作用。可以说，日本正在力图运用日美同盟这一世界上最强大的力量组合，谋求在冷战后的世界中占据更为有利的大国地位，日本的大国外交已全面展开。值得注意的是，日本的这一轮大国外交

亦含有干涉他国内政的内容，如将台湾海峡划入与美同盟的“防卫范围”等。

综观战前、战后日本的大国外交，不难发现两者有很大的差异，前者是排他性的区域大国政策，目的是要在东亚以及西南太平洋地区夺取霸权；后者则是有较大兼容性的世界大国政策，主旨是在政治、军事等方面与美国紧密合作，共同主导亚太地区的国际秩序，其伙同美国将两者同盟的防卫范围扩大至台湾海峡，明显含有抑制中国的意图。同时，日本还欲将日美同盟广泛运用于世界，以使日本在确保通商利益的同时，在国际上发挥更大的多方面的作用。

不过，我们对战前日本的大国外交可以作出确切的结论，但是，战后日本的大国外交起步不久，目前正在展开，日本的大国外交向何处去？这是国际上普遍关心的问题，也是研究者们在一个时期内无法准确回答的问题。本文亦只能对百年来日本外交中的若干重要问题提出些许新的看法。